

历史
人物
大观

历代风云人物大观



明清

李树清 编著

风云人物大观

MINGQING FENGYUN
RENWU DAGUAN



北京燕山出版社

1. 帝王后妃宫廷风云人物

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1328 年～1398 年），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公元 1352 年，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1355 年郭子兴卒，其部尽归朱元璋。后相继消灭陈有亮，张士诚等割据势力。1368 年称帝于应天（今南京），国号明，年号洪武。在位期间奖励垦荒，整肃吏治，抑制豪强，巩固中央集权，为明朝的江山奠定了基础。

艰难的少年时代

朱元璋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元天历元年九月十八（1328 年），明光东风湖荒滩上的朱家窝棚里，陈氏生下了她最小的儿子朱重八。他就是朱元璋。据说，他出生时，“陈氏在梦中遇神人授给她一个“置掌中有光”的药丸。陈氏在睡梦中将这丸药吞入了腹中，醒后口中尚有余香。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就更是红光满室，导致邻里都误以为朱家起火了，纷纷赶来搭救时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朱元璋是在苦难的家庭中度过少年时代的。现实中，朱家逃荒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东风湖的荒滩上。此后，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又拖家带口地到处流浪，儿女乞讨，夫妻做雇农，先后去过虹县、灵璧，最后来到了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太平乡孤庄村）。“上屋搬下屋，不见一箩谷”。经过了多次搬迁，朱家的处境，到了贫寒都不足以形容的地步。在传说中，儿时的朱元璋曾经饥饿得想去挖小老鼠吃，却在鼠洞中发现了大老鼠储存过冬的各种粮豆。于是大喜过望地兜回家中，让母亲将这些粮豆煮成了一锅粥，饱餐了一顿。对这锅粥的记忆，一直在朱元璋的脑海中盘旋，当他登基为帝后，还特意要求御厨在那天熬制。据说，这一天就是腊八，而粥就是腊八粥。今天的人们仍然在腊八这天食用各色粮豆杂果煮制的粥，相传腊八粥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在艰难中，时间推移到了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 年），这年朱元璋 17 岁。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甲申是他一生都不愿回想的年份。就在这一年，江淮大旱，蝗灾又起，瘟疫随之肆虐，逃荒的、病死的、饿死的，江淮一带十户九空，朱家也未能幸免。四月六日至二十二日，短短的十几天里，瘟疫和饥饿就夺去了朱元璋父亲、母亲、大哥、大哥长子，共四口人的性命。人死了总不能留在家。可是这时的朱家穷得四壁萧然，哪里出得起棺材钱？朱元璋只能和二哥一起，将亲人的尸体用草席裹着先抬到村外去。据说玄乎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地面居然涌成坟茔，将朱世珍夫妇给掩埋了。在传说中，这是老天爷为朱元璋这个未来皇帝选定的“风水宝地”，而且还特地为他做苦工，免去他挖土之累。与这样的玄乎相比，另一种说法更靠谱：两兄弟不忍将父母兄侄丢弃在乱葬岗，却又根本买不起葬地，于是抬着破席卷不知该往何处，只能在村外徘徊。缚席的草绳早已陈旧，一来二去的就散断了。兄弟俩无奈，只得将尸体暂时放在一处山坡下，两人先去向雇佣自家的大户哀求，指望能施舍一块葬地。再怎样的苦求，也没有激起大户丝毫同情。朱氏兄弟只能痛哭着回到山坡去。却吃惊地发现，方才一阵雷雨竟引致山上泥石崩塌，将家人遗体都掩埋了起来。目瞪口呆的朱家兄弟只能回村求助。幸好，这片山坡地属于另一富户刘继祖，他一口答应朱家兄弟就地为墓，埋葬家人。

凤阳是刘氏聚居地之一，此地先祖可上溯至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先前拒绝施舍葬地给朱元璋的大户也姓刘，与刘继祖还是至亲。二十年后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刘继祖被迫封为“义惠侯”。“殍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多年后朱元璋追想父母的死葬场景，依然难以控制情绪，嚎啕痛哭，这也成为他称帝后拒绝庆寿的原因。朱初一死后家人各奔东西的场面再次重演。随着朱世珍夫妇的弃世，朱家兄弟也不得不各谋生路。

朱元璋的大哥朱重四（朱兴隆）寡妻王氏带着剩下的一双儿女（后来的江西大都督朱文正及福成公主）投奔娘家，二哥留在破屋里为朱家守业以祭奠父母，三哥就近做了另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此户也姓刘）。

出家为僧

朱元璋 17 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朱元璋小时候常患重病，曾在当地寺院中寄名，后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而他出生前后又“异样”连连，母亲陈氏做为算命先生的女儿，认为这个小儿子实在“命硬”，不止一次想要干脆将他送去出家，都因朱世珍反对而中止。

如今朱元璋没处归着，又想到了母亲当年的计划，干脆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寄名的寺庙皇觉寺当了和尚（原址在安徽凤阳县凤凰山日精峰下）。然而破屋偏逢连夜雨，朱元璋本以为进了寺庙就能有片瓦遮盖，有充饥之食，却没有想到饥荒之年，寺庙所得施舍也极为有限，根本养活不了一众僧徒。和尚当了才个把月，朱元璋就不得不四处托钵游方。和尚游方，是好看的说法，但实际的情形却与沿街叫化乞讨没什么两样，还少了些头发。朱元璋在外游食，破衲芒鞋，走遍庐州（合肥）、光州（潢川）、汝州（临汝）、颍州（阜阳）等地，不但风餐露宿，而且途中卧病几死，历尽艰险和炎凉，才在三年后返回寺庙，过上了虽然贫困却还有屋顶遮风挡雨，也有粗衣淡饭保障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大约是自朱元璋出生以来最舒服的了。一眨眼，又是五年过去了。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大起义爆发。事实上在元朝统治的中后期，起义就一直没断过。而红巾起义最终结束了元朝的统治。点燃那根爆发起义引线的不是火，是水，是黄河水。自至正二年以来，黄河就象疯了一样，连年决堤泛滥，百姓民不聊生。拖到至正十一年，元政府终于议定了修复河道的主意。

四月，元顺帝命工部尚书贾鲁为河防使主持治河。贾鲁动用民工 15 万，再加淮扬驻军 2 万，共计十七万人之众，耗银“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在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修整了沿河缺口一百零七处，堵塞决口并使黄河回归故道。对于贾鲁的修河成就，明朝人曾评价说：“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认为贾鲁“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劳累，不畏讥评”，完成了一项泽惠后世的功业。然而这项治河工程，在当时却实在是劳役太重、时间太紧，加上直接役管的官吏不但鞭役务工的军民，还克扣他们的粮饷，更何况这些军民已经多年在灾害中饱受苦难却被元朝廷弃之不顾，积怨已到爆发的边缘。

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和栾城（今河北栾城西）人韩山童早已经在策划造反，并利用白莲教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还编出民谣广泛流传“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此时他们看准时机，将一只凿好的独眼石人埋在黄陵岗（山东曹县西南）附近的黄河河道处，有意让民工掘出。独眼石人出现的消息很快传开，使早已对韩氏父子深信不疑的教众群情振奋。刘福通又宣布说韩山童乃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定能“重开大宋之天”。决定择日起义，并以红巾为号。既是皇家后裔，准备做皇帝的，当然要有派头，搞些仪式。然而就在众人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消息却泄露了出去。还没能正式成事，韩山童就被捕杀，只有其妻杨氏和其子韩林儿侥幸逃入武安山。刘福通当即奔至颍州，宣布造反。由于策划已久，民怨又深，起义势头极佳，没多大功夫，红巾军就占领了颍州、上蔡、亳州、项城、息州、光州等地，直属人马超过十万。闻听消息，江淮各地纷纷响应，濠州富户郭子兴也是其中之一。

郭子兴祖籍曹州，其父原是个到处游走的算命先生。某日这郭先生游至定远（今安徽定远），正遇上城中某巨富为嫁女发愁。皆因此女天生盲眼，时人害怕日后儿孙亦盲，因此根本无人敢于问津。郭先生便“见义勇为”地应承了下来。婚后盲小姐不但为郭家生了三个

身强体壮的健康儿子，还带来了大笔嫁妆，郭家从此大富，也为郭子兴后来结纳四方强梁、担当领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郭子兴是那位算命先生的次子。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郭子兴集中自己平日交结的数千人，攻占了濠州（即凤阳），从此也成为红巾军的一路统帅。

此时的朱元璋，正再次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元将彻里不花被派来平息濠州民变，然而他根本不敢与红巾军正面交锋，唯一的本事就是四处杀戮平民抢掠财物冒充军功俘获。至正十二年的二月，灾难波及皇觉寺，寺院不但被元兵抢掠，还被放火焚烧，幸亏和尚没啥头发难以冒充敌首，僧徒们的吃饭家伙才得以保全。24岁的朱元璋也随着逃命的僧众离开了皇觉寺。然而众人皆有去处，他却发现自己留在家乡的二哥、三哥以及各自妻儿都命丧兵乱了。朱元璋只得回到一片狼籍的寺院，在神像前动用起外祖父的本事，向天占卜吉凶。可是无论是当和尚还是重拾家业，问卜的结果都不吉利。他想起曾有红巾军中的同乡劝说自己投军，决定为此再卜一次。结果这一次得了个上上大吉，大喜过望的朱元璋遂于闰三月甲戌（四月）这天投奔濠州郭子兴，开始了他的军伍生涯。

应天称帝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朱元璋并不满足已得的地盘，他要大展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进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争夺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灭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

建国后，他采取与民休养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极大的加强。论起来，朱元璋恐怕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俭朴最勤政的一位。据记载，在修建南京明皇宫时，他下令取消所有的华丽装饰，宫室墙壁上仅有少许彩绘，而且内容都非常正统：后妃宫室绘耕织图；太子宫室绘朱元璋开国事迹图；而他本人起居的宫室墙上更是连彩绘都没有，全是历代治国箴言。除此之外他还是唯一一个把御花园改成“御菜园”的皇帝。洪武朝的明皇宫内连假山花木都没有，更别提造什么庭园。所有的院落空地里都栽上了菜，宫中菜蔬自给自足，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为主，酒肉甚少。理政倦怠时他便在菜地里徜徉，欣赏众人热火朝天的种菜景象。这藩风光似乎比小桥流水更能使他恢复精力。做为雇农加绿林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也按自己心目中的田园风光为农村制订了细致的规律并要求百姓们严格遵守。在他的打造下，所有的乡村都要选派有声望的老人每月宣讲道德规范，每到农忙季节，人们还必须在乡中老人的监督下黎明即起忙碌农活，若有偷懒生事的，不但自己要糟，就连乡老都不能避免责任。不好好干活的青年，甚至会被流放边疆。朱元璋同情百姓，厌恶凌虐百姓及偷懒不劳而获者，这在下面的诏书中一览无遗。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

早在登基之前，朱元璋还亲自带着长子朱标在农家住了好几天，要求自己的继承人体味民生疾苦，稼穡艰难。洪武三年天下大旱，朱元璋不但第一时间下旨免了灾区税赋，还带着

所有的皇子在六月南京的烈日下暴晒，用这种中国民间最朴实也最自虐的方式求雨。这一晒就是五天，当大雨倾盆而落时，举国上下都认为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天。朱元璋并不仅仅是要求百姓勤于耕织，他也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自登基以后他事必躬亲，而且还严格遵守着自己制订的“百姓黎明即起”的时间表，除非病得不能起来，他都在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早朝，无论寒暑秋冬都雷打不动。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面对这样一个“以身作则”的皇帝，臣民们也只得将制度遵循不渝。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讨生活时，无论受到怎样的待遇，都坚持要把自己接到的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不但促成了他成就大业，也清清楚楚地表现了他的治国方面：水必要至清，人必须克己。他自己是这么办的，也要求别人这么办，而且不许违反。然而如大家所知，一样米养百样人，世界上的事情一旦到了极端的地步，即使出于好意，麻烦也就要大了。

朱元璋出身赤寒，因此对底层小民百姓感情很深，对官吏士绅文人却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做贫农和造反的经历，更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吏欺压百姓是倾覆王朝的直接导火线。因此，为了避免百姓遭殃更为了巩固政权，他对官吏采取了严格的管治，对农民却颇为慈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大力支持“民告官”，官吏若到乡间骚扰被百姓抓住控告并有据可查的话，他绝对是一面倒地支持，非但重处被抓官吏，还要重奖告官的乡民。他还编制了《明大诰》，专用酷刑重处官吏。只是此法实在残酷，动辄为几十两银子就将官吏剥皮槁草，或者并未贪污虐民也照样连坐，甚至砍头凌迟。因此《明大诰》及相关法令在朱元璋死后就被立即废止了。——事实上，百姓们虽然痛恨官吏欺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真愿意为几句闲话几两银子就把他们处死，何况吏员们多是百姓邻舍出身，祖辈相交，就更没有谁愿意造成如此后果。

朱元璋的人生经历不但使他厌恶官绅文人，也使他不信任异姓功勋。对于这些引起他疑心的人，他也像严治贪官那样用最极端的手段去解决。对于明王朝开国元勋们的死，史料和传说都找出了若干理由。但在事实上，猜忌并计划杀戮功臣的事情，恐怕早在登基称帝之前，在带着儿子朱标过那几天农家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在朱元璋的脑子里成形了。

洪武三年，元顺帝北逃，朱元璋真正成了中原之主。就在这一年他大封诸子及开国元勋。受封的皇子皇侄孙共计十人，元勋三十五人。就在这一次封赏中，刚得天下的朱元璋就毫不客气地显示出了他对功勋们的忌憚。按照朱元璋的意旨，开国元勋的功绩再大，也只能被封为公爵，所得的俸禄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次一等的元勋封侯爵，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然而对待儿女们，朱元璋可就不一样了。他公开对元勋们宣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对于皇帝这样的主张，群臣哪敢有意见？只得稽首对曰：“陛下分封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既是“天下万世之公议”，皇帝也就不客气了。于是：皇帝的儿子们封亲王，岁俸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纁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皇帝的孙子们岁俸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皇帝的孙女们岁俸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侄孙朱守谦封靖江郡王，亦有岁俸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受封后岁俸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直到洪武二十八年，由于皇子凤孙实在太多，不得已减少了俸禄，也达到亲王一万石、郡王公主二千石，郡主八百石的程度。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特命诸皇子亲王在自己的藩国内豢养甲士，少则三千，多则一万九千，并且要“常岁训将练兵，临视周回险易，造军器务精坚堪用。”既然藩王们都有自己的甲士，当然就要应征出战。于是在战功封赏方面，朱姓诸王所行也格外不同。

洪武年间，秦晋燕楚湘等亲王都曾经数次领兵出征，朱元璋据此给了晋王燕王各一百万锭重赏，楚王所得最次，也达马三千匹牛二千头牦牛一千头羊九千只。与之相比，攻取元

都定理中原的徐达只得了白金五百两，文币十表里；常遇春只得了文币一百表里。对于这样天差地别的赏格，就连后世记载此事的书生，都不禁要发出叹息：“难道说攻取元都所得的府藏不够丰富，所以赏得这么少吗？”如果光是封赏少还好说，最大的问题是，就连这么些儿俸禄封赏，开国元勋们都不能保自己一生安享。

屡兴大狱

民间有个“火烧庆功楼”的传说，讲的是朱元璋在登基后曾经大宴功臣，却在宴中借故走开，并下令火烧宴席现场，将所有功臣全部烧死。这个传说实在有些荒诞不经，不过事实上朱元璋的许多开国元勋们结局并不比烧死好多少。一般认为朱元璋杀功臣是由于忌惮他们日后扰乱朱家天下，是在为接班人“除去荆棘”。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要求苛刻，不但是眼里进不得沙子，根本几乎连灰尘也容不得，而且从不讲什么功过相抵，功臣们也就只得落得如此下场。

由于皇帝多是如此手段，因此民间也就有了各种传说。例如水军统帅俞通海，他本来是在攻张士诚时受伤，于朱元璋登基称大明皇帝前就病死了的（死于1367年四月初十），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朱元璋派人在他家所住的街道上修了一座“百猫坊”（据说俞宅就在今天的南京彩霞街菜场一带），把附近一条巷起名为“赶鱼巷”（今甘雨巷），又派侍卫每天在秦淮河上钓鱼，还将钓上的鱼活活晒死。最终逼得俞通海只能寻了自尽，虽然这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但百猫坊确有，位置也确在俞府附近，有可能遭殃的是俞通海的后人或亲信吧。由此已足见朱元璋杀功臣事迹之一斑。

在打击官吏的时候，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宁肯杀错也不放过。真正的贪官污吏当然死路难逃，可是清正廉明的官员也像割草一样地被他一批批除掉。加上朱元璋并非什么政经全才，很多时候他对很多事情也弄不清楚，可是即使如此，他在一头雾水中也照样喊打喊杀不误。算起来，被酷刑杀掉的父母官恐怕比贪官污吏还多。多少出身寒苦农家一心想报效国家又维系着全家希望的读书人，在十年寒窗苦读后，才刚刚进入仕途，只为真正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成了冤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当时的济宁知府方克勤。他虽然当上知府，仍然是一件布衣穿十几年，一日两餐素食粗粮，治下百姓则富足安乐。当他要调离时，百姓甚至做歌谣挽留道：“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就是这样一个好官，在洪武八年（1375年）的泼天冤案“空印案”中，也被毫无理由地处死。这个方克勤，就是后来著名的建文忠臣方孝儒的父亲。“空印案”说来其实很简单。按规矩，各司府州县都要将地方财政状况上报户部，由于财务表是人工核计，各地距京城路途遥远，为防有何差错跑冤枉路，官吏们都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盖印文书，方便随时修改。然而无论别人怎样解释，毫无会计知识的朱元璋偏要认定这是在贪污，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下令自户部尚书起，到各布政司、府、州、县，所有管官印的地方一把手都统统砍头，副手杖一百充军。上书辨冤的郑士利则被罚做苦工。更糟糕的是，朱元璋猜忌并报复强烈的脾性并不完全是针对元勋和官吏们的。

当年攻打张士诚的“东吴”政权时，朱元璋的“西吴”军曾经遇到过苏杭百姓的强烈反抗，以致于苏州一座孤城竟能在围困下坚持九个多月，战死了不少将士。张士诚死后，朱元璋决意报复民间对张士诚的支持，他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赋税。于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苏州松江地区的税赋一古脑儿涨到了元朝的三倍、更超过了宋朝的五倍。一亩地的税粮竟超过七斗。苏州一府所要交纳的税赋，竟达到全国税赋总量的10%。除此之外，松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总括言之，就是“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由于朱元璋本人家族就是“逃税流民”出身，外祖父又曾经是个打着算命先生招牌反朝廷的人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规定百姓们必须彼此互通邻里信息，对别人的家庭内务乃至活动场合都必须了解，谁要是想保留隐私瞒哄大众，即可捉拿送官。行医卖卜的人也只允许在本乡活动，若敢远游就要重治。

这些规矩对民众的约束，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皇朝，充满戾虐气息。而要求世人窥伺告发自己邻里亲朋的规矩，更成为流祸久远的重弊。

朱元璋还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刚愎自用，完全不把人命当一回事。无论什么事，不用调查也不用研究，只凭一时情绪，就“挥洒自如”地把好人或者轻罪之人统统杀了。如空印案就使人领略到了他的这一“特色”。说到这个，蒙古族官员道同的冤案就不能不提。

道同先世蒙古，后改汉姓，是河间人。明朝建立后，他出任番禺知县，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也是一个诚意为民的好官。史书称，番禺守军蛮横，胡作非为，几任县令都不敢为民出头，直到道同莅任，才改变这一状况，“民赖以少安”。谁知不久永嘉侯朱亮祖到了番禺，这家伙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却几次三番被道同顶了回去。当地豪门大户知道朱亮祖与道同不“道同”，因此纷纷贿赂朱亮祖求他为自己出头，朱亮祖便请道同吃饭，要他释放被当街示众的富豪悍仆。道同立即厉声质问：“你也算是堂堂大臣，怎能与这些人为伍？！”朱亮祖哑口无言，宴席不欢而散。

朱亮祖回到家里，越想越是恼怒，立即派人强行打碎锁铐放了那帮地痞，又把前来论理的道同鞭打了一顿。此后番禺地方的恶霸们以为有了护庇，纷纷得意忘形。尤其是朱亮祖在当地所纳小妾罗氏的兄弟，更是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道同为民出头，将罗氏兄弟抓了起来。谁知朱亮祖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而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傲慢无礼”。事情到了这一步，道同就是想忍让也不可能了，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他原以为按常理，皇帝怎么也要派人调查核实，才会最后做出决定。可是朱元璋一看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杀手出发不久，道同的报告也到了。朱元璋这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事，觉得道同夙直为民，实在是难得，马上派飞骑去追赶杀手。然而由于道同得罪了广东布政使徐本雅，后一位使者虽与杀手同日抵达番禺，却被人有意拖延，直到杀手处死道同，赦使才被放进县衙。对于道同的冤死，番禺百姓都十分痛惜，纷纷在家中设立他的牌位祭祀。据说每有灵验，乡间从此传说，道同已经成了地方之神。直到今天，番禺地方仍在祭祀道同神。朱亮祖的行径引起了朱元璋的震怒，这个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而不是按司法程序办理的皇帝在大怒下立即命人将朱亮祖父子锁拿进京。

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一起被朱元璋当廷鞭死。可惜的是，道同之死并没有警醒朱元璋，此后仍有数不清的人在这位皇帝的一时火性下无辜丧命，更糟的是他处死朱亮祖父子的方法：从此开了明王朝“廷杖”的先例。终明一朝，数不清的士大夫和清臣直士，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开杀戒的朱元璋渐渐觉得法规碍事，终于在洪武十五年决定改革禁卫军为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出名也最为其重用的，则是“锦衣卫”。这个锦衣卫有“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的职能，处理皇帝钦定的案子，相当于皇帝的私人警察部队，下设南北两个镇抚司，五个卫所，拥有自己的监狱，在其中任职的校尉力士少则一千多则六万，被称为“缇骑”。他们有权自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锦衣卫将正常的司法机构视若无物。只要他们看不顺眼的，无论是宰相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不需要任何真赃实罪，都可以在片刻间让人家破人亡。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一万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重用藩王领兵，当初对于朱元璋来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构想，既可避免外姓诸臣节制军事跋扈成灾，又能使诸王“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何况照他的预想，诸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然而朱元璋怎么也没有想到，长子朱标竟早早地就在洪武二十五年去世了，晚年的朱元璋面对幼弱的皇太孙朱允炆，虽知重用藩王领兵可能会为这个文弱小儿埋下隐患，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甩下自己的儿子去用那些令他一百个不放心的外

姓大将，于是他始终还是没有把削藩提上议事日程。只是一再地寄希望于能在自己生前为太孙多聚些人脉众望，寄希望于朱家子孙都懂得尊老爱幼之理，体恤骨肉血缘之亲。大约也正是出于这层考虑，老皇帝先是应允孙儿修改了自己施行多年过于苛刻的刑律七十三条，为朱允炆赢得了“天下莫不颂德”的美名。在洪武二十九年的时候，他还特地重新制定了朝见太孙之礼，又规定叔父们在公开场合须向侄子行君臣之礼，回到后宫皇太孙才向叔父们行家礼。为了增进家人感情，第二年他又让其它的侄辈和叔辈们一起游历天下山川。

洪武三十一年闰四月乙酉日这天，朱元璋抛下他的嫡长孙朱允炆，还有他那一大家群儿子，以及在他多年治理下民生休养生息逐渐兴旺的大明帝国，离开了人世。139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太宗朱棣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建文四年（1402年）攻入南京，夺取皇位，次年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在位期间疏通河道，发展农业，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发展强化专制统治，使永乐期间出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

身世传说

朱元璋的嫡妻马皇后生了两个女儿，还生了排行最前的五个儿子，朱棣是老四，乃是朱元璋的嫡子，很符合“立嫡”的要求。然而对于他的生母是谁，却议论纷纷，说法不一，朱棣的母亲是朱元璋攻取元大都时掳来的元顺帝妃嫔，她进入明宫不久就生下朱棣，朱元璋疑心儿子是元顺帝的骨血，便以“铁裙”之刑处死了妃子，将孩子送给马皇后抚养。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女儿，没为朱元璋生过儿子，包括早死的太子朱标在内，五个归在她名下的儿子其实都是庶出的。其中朱标朱棣朱榑为李淑妃所生，朱棣朱橚为碯妃所生。在朱元璋的后宫中，地位仅次于马皇后的女人一直都是孙贵妃，她没有儿子，因此死后朱元璋特命周王朱橚行孝子礼。生了三个儿子给马皇后的李淑妃，却直到孙贵妃死后十年、马皇后死后两年，才被朱元璋册为“淑妃”，朱棣在对待高丽籍妃子的态度上也并不见得有多偏向。他的后宫中虽然有权贤妃、任顺妃、李婕妤、崔美人、韩氏（传说中还有吕庄妃吕康妃）等等高丽妃嫔，但她们所得的待遇并不见佳。在徐皇后死后，朱棣最宠爱的是苏州人王贵妃，命她掌管后宫。这位贵妃没有儿子，死后朱棣命儿女们为这位庶母守孝，一如朱元璋待孙贵妃之礼。而在高丽诸妃中最为得宠的权贤妃，虽然也和王贵妃一样无子而终，却根本没有得到王氏身后享有的待遇，其它的高丽妃嫔就更是糟糕，不是触怒朱棣被处死，就是在朱棣死后被遗诏殉葬。

马皇后的生育问题、朱棣的生母问题，由于年代的久远已经很难有令所有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对于朱棣，很容易使人感觉到不管是他的雄才伟略勤政富民，还是他的暴躁杀戮，甚至于他的外貌个性，都承自给予他生命的父亲朱元璋。而无论他是以怎样的身份和方式登基称帝，他最终都完成了一代雄主“威德遐被，四方宾服”的任务，将父亲一手创建的大明王朝推向了顶峰，使之成为“明帝国”，并将皇位顺利地传给了自己的子孙。

崭露头角

朱棣的父亲朱元璋不但对儿子们的管教非常严，还对他们寄予了“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厚望。为了避免皇族孱弱，明初的藩王们虽然贵为皇子，却自幼就接受兵事训练，朱元璋还时常在凤阳家乡等地针对皇子们“讲武”、“练兵”，给他们上军事课。当时的明王朝并不能算真正平安，元顺帝北逃之后，元皇族在北方建立了北元政权，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因此明初皇子们多数封往边塞重地，太原、北平、西安、开封、大同、宁夏、平凉、桂林、云南、大宁等，遍布在明王朝的整个边防线上。

亲王们在各自的封國中屯田筑城练兵，被称为“塞王”。（如十七子宁王朱权藩大宁，其地在河北遵化喜峰口外，乃是千百年皆然的军事重镇，六百余年后还是抗日“大刀队”发

生地。朱权在此重镇治藩属护卫兵，竟达甲士八万、兵车六千）。亲王们既有了这样的实力，当然就要在国家发生战事时，亲带各自的兵将奔赴战场，渐有取代开国元勋之势。在一系列的战事中，燕王朱棣很快就崭露头角。洪武二十三年，他应命与晋王朱櫓出征元丞相咬柱、平章乃儿不花，开国元勋傅友德冯胜也要受他们的节制。

三月，北方大雪封山，晋王朱櫓畏惧元兵掌握的天时地利，不敢追击，只有朱棣不惮劳苦，冒雪行军，出奇制胜地堵住了乃儿不花，迫使其投降。乃儿不花投降后，朱棣对其非常优待，乃儿不花被朱棣打动，主动去劝降咬柱。最终，朱棣满载而归，成功地取得了这次重大战事的胜利。30岁的朱棣在这次战役中不但辉煌亮相，而且得到了真正的军伍锻炼。对于儿子智勇双全的表现，朱元璋大喜，颇有“此儿像我”之感，此后朱棣越发受到重用，和晋王一起得到了直接向皇帝本人禀报军事要务的权力。

夺取皇位

朱棣11岁就被父亲朱元璋封为燕王，并于21岁就藩北京，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他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可谁知就是这个四皇子，竟利用手中的兵权最终夺取了皇帝的位子，这是当初朱元璋无法预料到了。朱棣在北京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了一位合格的军事指挥家，并在对元朝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洪武末年已经成为北方最强的一个诸侯。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即位之初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必要的改革之外，便在齐泰等人的提议下开始削藩。在先后削夺了五位番王后，建文帝的矛头直指燕王朱棣。朱棣也立即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发动靖难。由于洪武时期的功臣已经被朱元璋杀戮殆尽，因此朝廷只得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但由于朝廷的兵力强大，双方还是处在一个拉锯战的形势下。而此时建文帝的软弱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一些列决策错误，加之朱棣直捣南京策略的成功，建文四年，朱棣占领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年号永乐。

永乐初年，为清除建文余党，朱棣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明朝宦官专政的祸根。

永乐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因为当时有人传说建文帝从海上逃跑了，朱棣担心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就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朱棣为人好大喜功，当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四海都应该来朝贺，因此他派郑和下西洋去接各国的国王来朝贺，以衬托盛世。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历时整整三年的“靖难之役”终于结束，明王朝的京城南京被燕王军攻陷。皇宫里燃起了熊熊大火。在火光中，建文帝不知所踪。民间传说，朱元璋早已预料到以孙子的性情本事，终不免这一天，所以早就为他准备下了一只铁箱，其中装着逃离南京的方法，还有袈裟度牒。建文帝只得借火遁。

朱棣起兵时虽以清君侧为名，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叔侄间一旦分出胜负，绝不是除掉两个大臣，而是要变易皇权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朱棣虽在攻入南京前向大嫂吕氏（故太子朱标继妃）做了种种保证，仍然于四天后登上了皇帝宝座。而朱标的儿子们，除了不知下落的建文帝、早死的朱雄英之外，另三人都陆续被朱棣除掉，不得善终。

朱棣雄才大略一如父亲，文治武功更出于其上，在他的手里，明王朝达到了被史书称为“远

迈汉、唐”的水平。但他当初以“靖难”起兵，嗣后却又自己登基称帝，怎么也有点说不过去。因此能否把自己说得名正言顺，也就成了朱棣的当务之急。

所作贡献

朱棣的另一个壮举就是建造紫禁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随时都有战争的可能，南京距离较远，指挥不便，因此朱棣下旨建造紫禁城，准备迁都。1416 年开始修建阿北京宫殿，1421 年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四库全书》却有很多内容被编者修改了，使古籍的原貌遭到了破坏。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书之冠的称号。永乐十年以后，朱棣开始了北征，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北征的频率越来越快。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北征，除前两次有所斩获外，其余多为劳民伤财，使得刚刚恢复的经济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424 年七月，朱棣在第五次北征时，病逝于榆木川，在位 22 年，终年 65 岁，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

2. 将相治国起义首领风云人物

邓愈

邓愈（1336～1377 年）初名友德，字伯颜，虹县（今安徽泗县）人。明朝开国十大回回名将之一，原名友德，“愈”为明太祖朱元璋所赐。邓愈少年时便随父兄抗击元兵，骁勇异常，16 岁被推举为起义军首领，后来投奔朱元璋麾下。邓愈战守有方，激励将士，以弱制强，乃是常胜将军。洪武三年，邓愈以征虏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徐达出定西，破元将扩廓帖木儿，克河州，招抚朵甘（今青海、四川一带）、乌斯藏（今西藏）诸部，以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卫国公，同参军国事，岁禄三千石，并赐予世袭。洪武五年，邓愈平定西南之乱后班师途中，暴病死于寿春（今安徽寿县），时年 41 岁。明太祖追封其为宁河武顺王。灵柩运到南京水西门时，明太祖亲往祭奠，又亲自为他选择墓地，进行国葬。

邓愈 17 岁领兵抗元。次年，率众加入农民起义军朱元璋部，任管军总管。元至正十五年（1355 年），从朱元璋渡长江，克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破集庆（今南京），取镇江，屡立战功，升广兴翼元帅。继率部南下，取广德（今属安徽）、宣城（今宣州）、徽州（今歙县）。十八年，转战浙西，屡败元军，升金行枢密院事。后进兵江西，挫败长江中游汉政权首领陈友谅部，升江南行省参政，总制各翼军马。二十二年，守洪都（今南昌），降将祝宗、康泰复叛，乘夜破城而入，邓愈仓促率数十骑奔还应天（今南京）。次年，从大都督朱文正复守洪都，抵御陈友谅大军往攻，防守要冲，三月不解甲。鄱阳湖之战后，奉命平定江西未附州县，升江西行省右丞。二十五年，调任湖广行省平章。明洪武元年（1368 年），以征戍将军率师克南阳、鲁山（今均属河南）诸地。三年，以左副副将军从大将军徐达远征甘肃，击败北元军。后分兵进克河州（今兰州西南），招降吐蕃（在今川、青、藏交界地区）、乌斯藏（在今西藏中、西部）诸部，封卫国公。四年，赴襄阳操练军马，督运粮饷，保障明军攻夏。十年，任征西将军，平定吐蕃反抗势力，抵昆仑山而还，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病卒。邓愈为人简重慎密，智勇兼备，严于治军，善抚降者，功著一时。

在南京雨花区的纬八路旁，有一座“山高水长”的石牌坊，这就是明朝开国功臣邓愈的墓冢。明朝开国功臣墓有一部分在紫金山阴，另一部分在南郊（雨花区），都是爵位很高的功臣。邓愈墓神道石刻保存的较好，现在有神道碑、一对石马、一对马倌、一对石虎、一对石羊、一对文臣和一对武将。现在这里以邓愈墓为主中心建成了邓府山公园。邓愈墓神道石刻周围修建了一些仿古建筑，便于游人休息。邓愈墓的神道碑不如徐达墓和李文忠墓的神道碑那么大，但石碑雕刻很精美。一对石马与其它功臣墓不一样，石马腹下是实的，两边刻着精美的云纹，意为天马。邓愈墓的石虎和石羊造型颇佳，特别是石羊的造型得体大方。另外，文臣和武将的五官突起，样子怪怪的，好像当时的工匠并没有研究过人脸部的造型。邓愈墓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李文忠

李文忠（1339～1384），明朝开国名将，十大回回将领之一。字思本。盱眙（今属江苏）人。朱元璋外甥。

元至正十七年（1357），率亲兵增援池州（今安徽贵池），破长江中游汉政权首领陈友谅部。继引兵东向，连挫元军，于十八年克旌德（今属安徽）、淳安（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地，升帐前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继与广兴翼元帅邓愈会师，克浙西重镇建德。不久，击败元陆军，取部分首级置于木筏，顺流而下，使元水军惊慌逃遁。二十五年春，率军救援新城（今诸暨南），乘雾进攻，俘斩江浙周政权首领张士诚军数万。次年秋，克杭州，获张军降兵 3 万，

升浙江行省平章。明洪武二年(1369年)，以偏将军从征虜副将军常遇春克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回师途中常遇春卒，李文忠率部援大同，屡败北元军。三年，以征虜左副将军率步骑10万，与大将军徐达分道北征，至应昌(在今达来诺尔湖西岸)获元兵5万，升左都督，封曹国公，同知军国事。后又数次北征，屡胜。十二年，与西平侯沐英进兵洮州(今甘肃临潭东)，平定起事番民。还军掌大都督府兼领国子监事。李文忠好学问，通韬略，交儒士，严治军，临阵奋勇，战功卓著。后因劝朱元璋少诛戮而受责。不久病卒。

歧阳王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抚以为子，故曾一度改姓朱。李文忠自小随朱元璋出征，深受宠信，19岁为将，骁勇善战；官至荣禄大夫，浙江省平章事，封曹国公，后诏命李文忠主持大都督府(最高军事机构)，兼主管国子监(全国最高学府)。1380年，朱元璋担心功臣觊觎皇位，便寻找借口，屠戮功臣，翦除异己。李文忠为人正直，曾三次冒死苦谏，而被削去官职，幽闭在家。两年后，郁闷病故，时年46岁。追封“歧阳王”，谥“武靖”，踢葬钟山之阴。

李文忠墓在今太平门外蒋王庙。墓前有神道碑、石柱、拉马侍、石羊、石虎、武将、文臣等石刻，保存较好，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其神道碑看上去不比徐达墓神道碑小，只是矮一些，但一样精美。作为皇亲国戚，李文忠的地位不比徐达低。奇怪的是这通神道碑不在神道中央，而在神道的东北侧，估计这些石刻都因修路都进行过了位移。一对完好的望柱是其它功臣墓都没有的。一对拉马侍只有一只雕刻很完整，而另一只不知什么原因只雕出了雏形就弃在了一旁(很可能是在开凿石料时雏形凿的不准，便弃在一边了)。这只拉马侍保存完好，雕工精美，与常遇春墓的拉马侍不同，其为文官拉马。石羊和石虎与徐达墓的相似。武将、文臣与徐达墓的相似，雕刻十分的精细，武将盔甲上的细节雕刻的十分清晰，文臣的朝服和朝冠的饰纹，还有身上的玉佩都雕刻很细致。虽然细节出色，但整体造型却略显呆板，人物没有表情。

现在李文忠墓正在整修准备开放，这里还是南京文物研究所的所在地，曾经准备建一个以介绍南京明代功臣墓为主的博物馆和小公园。但李文忠墓整修工程象马拉松工程，拖了几年还未完成，一拖再拖，而离这里不远的白马公园不到一年便建成。而且墓园外观整修的非常俗气，电动门，大理石与古代墓园极不协调，大门上竟用几个大金字-歧阳王陵园，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只有皇帝的墓才能称陵，大臣的墓被后人改为了陵，真叫人哭笑不得，看来文物界也有不学无术的。真希望徐达墓和李文忠墓早日开放，使广大市民能欣赏到这些精美的神道石刻。

汤和

汤和(1326~1395年)，字鼎臣，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人，明朝开国名将，军事家。立功颇多。洪武十七年至二十年间(1384~1387年)在江、浙、闽沿海等地，整顿海防军备，有力地抵御了倭寇的侵犯，去世后被迫封为东瓯王，谥曰襄武。

汤和自幼与朱元璋为同乡好友。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郭子兴农民起义军，后以功授千户。十四年，在滁州击败元军，升管军总管。次年，从朱元璋取和州(今安徽和县)，渡长江，克太平(今当涂)，俘元义兵元帅陈野先。十六年参加集庆之战。后从徐达攻镇江(今属江苏)，升统军元帅。二十四年，迁平章政事，率师援浙江长兴，与诸将击败江浙周政权首领张士诚军，俘士卒8000，解围而还(参见)。二十七年九月，从徐达克平江(今江苏苏州)，执张士诚。十月，充征南将军出兵浙江，迫方国珍乞降，得士卒2.4万、海船400余艘。浙东悉定，遂与副将军廖永忠率舟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取海道入福建，在福州、漳州、泉州等地连败元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部。

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克延平(今南平)，俘陈友定。八月，以偏将军从徐达西征，自山西渡黄河，入潼关，围庆阳(今属陕西)，俘斩元将张良臣。三年，以右副将军从徐达征

漠北，俘北元亲王、国公以下 8.6 万余人，迫元将扩廓帖木儿奔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乘胜平定宁夏，追逐北元军至察罕脑儿（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东南）而还。封中山侯。四年，任征西将军，率水师溯长江进攻四川，在征虜前将军傅友德部陆路配合下，克重庆，迫夏政权首领明升出降，夏亡。此后，数出北平（今北京）、山西、延安（今属陕西）等地练兵、筑城、备边，屡败扰边的北元兵，迫北元将伯颜帖木儿乞和。十一年，封信国公，参议军国大事。十四年，以左副将军征漠北，获北元平章别里哥、枢密使久通。十八年，任征蛮将军，平息贵州思州（今岑巩）、古州（今黎平西北）等起事。十九年还师，得悉朱元璋欲解诸将兵权，自请解职归里。后应朱元璋之请，出巡山东、浙江沿海备倭，筑卫所城 59 处，征兵民 5.8 万余戍守，倭寇不敢轻犯。二十一年，还居中都（今安徽凤阳）新第，将所得赏赐分送故交。晚年益加恭慎，终年 70 岁。

汤和墓位于蚌埠市东郊曹山。汤和，凤阳人，与明太祖朱元璋为同乡好友，元末随朱起义，屡建战功，官至信国公，死后封东甌襄武王。墓面对龙子河，背负曹山峰，水光山色，交相辉映，墓室是一座依山构筑的大型砖石单券式建筑物。高 3 米，宽 3 石 6 米，面积约 40 平方米。墓南神道，长 225 米，有大型神道碑和石雕马、羊、狮、武士，雕刻线条流畅粗犷，当代古建筑学家认为，此系明初石刻中的精品。现已划入蚌埠市的龙湖公园。

常遇春

常遇春（1330～1369 年），字伯仁，安徽怀远人。貌奇体伟，勇力过人，猿臂善射。原来当过土匪，在和阳归顺了明太祖朱元璋。明初名将。在朱元璋的部队里为前锋，朱元璋攻灭章士诚，北上灭元，都用做副将军。身经百战，经常打胜仗。

常遇春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麾下的一员骁将。他身为军中前锋，作战勇猛，席卷幽燕，直捣元上都。由于他曾攻克了开平府（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被封为开平王鄂国公。洪武二年（1369 年），年仅 39 岁的常遇春因得“卸甲风”，攻克开平还师时病死于柳河川军中。朱元璋痛失爱将，以诗悼之，“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并将其作为陪葬明孝陵的勋臣，择墓于南京太平门外，赐给祭田。后又在南京鸡笼山下建的功臣庙中，将其居于首位以祀之，甚见尊礼。

戎马生涯

至正十五年（1355 年）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军渡江南下，在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着乱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即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缘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改为应天府。集庆及其周围地区的占领，使朱元璋获得一块财富之区，为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战斗，常遇春锋芒初露，立了头功，开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元至正十九年（1359 年）七月，朱元璋攻取金华后，派遣大将军常遇春进兵攻取衢州。常遇春率部一路杀将而来，首先攻取了龙游城。他在戎马倥偬间，还吟赋《龙游道中》一诗以纪行：“策蹇龙游道，西风妒旅袍。红添秋树血，绿长旱池毛。比屋豪华歇，平原杀气高。越山青入眼，回首鬓须搔。”字里行间，流露出英雄豪气。当常遇春率领马、步、水三军到达衢州城下时，但见城垣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守城的元将伯颜不花的斤，是维吾尔族人，荆南王朵儿的斤之子。1356 年授衢州路达鲁花赤，因功升浙东都元帅，擢江东道廉防副使，分守衢州。伯颜还擅长诗歌，通晓音律，工于书画，他的《古壑云松图》至今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城中当时还有位汉名马浩的高官，即衢州路总管薛超吾儿，出身贵族，也是维吾尔族人，曾两度治衢，政绩显著。他与萨都刺、鲜于枢等交谊甚笃，也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常遇春率部在城下树栅栏，建奉天旗，从陆上、水上将衢州 6 座城门团团围住。常遇春又造

吕公车、仙人桥、长木梯、懒龙爪等攻城军械，“拥至城下，高与云齐，欲阶以登城”，他又在大西门城下“穴地道攻之”。伯颜不花的斤面对常遇春部的猛烈进攻，凭借坚固的城垣，“以束苇灌油烧吕公车，驾千斤秤钩懒龙爪，用长斧砍木梯，筑夹城防穴道”，双方交战激烈，常遇春久攻不克。后来，常遇春以奇兵出其不意地突入，毁其所架之炮，攻围甚急。元军支持不住，遣使密约投降，衢州路院判张斌夜出小西门，迎常遇春大军入城。这样，元军甲士万人，才迅速崩溃。常遇春攻取衢州城后，立“金斗翼元帅府”，设元帅和枢密分院判官，元朝在衢统治势力遂荡然无存。常遇春南下立功，升任元帅勇猛敢战，这是常遇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并贯穿于历次重大战役。

常遇春率军队进驻九华山时，适逢天旱无雨，士兵饮水困难。于是，他亲自带领将士在九华山下寻水，忽然在五溪桥南边挖出了六股泉水，解决了部队饮水的困难。这六股泉水泉水是否为常遇春所发现，无从查考。但是常遇春结寨六泉口，大战九华山却是千真万确的。后人诗可证：“偏仄旁山行，溪流咽不鸣。何年留古砦，犹复说开平。”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初，朱元璋令常遇春与另一名大将徐达率重兵镇守池州防备。陈友谅统其兵众，部署袭取池州。徐达侦悉陈友谅的行动，令常遇春率精兵万人，设伏于六泉口。陈友谅兵至，全力猛攻池州城，徐达率领守军开城出击，常遇春伏兵掩其后，大破陈友谅军，斩首万余，擒捉三千，陈友谅败走江州（九江）。这次战役不仅恢复了皖南军事要地太平县，也使汉军龟缩于武汉不敢再犯。论功行赏常遇春功劳最大。朱元璋夸赞他说：“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常遇春当年设伏的地方就在今天九华山的大古岭、凤凰岭一带，并在百丈潭前留有诗文：“赤汗透征袍，何如孝隐高。结庐亲冢侧，只为报劬劳。”

战功卓著

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陈友谅占据上游，精兵大舰，雄心勃勃，是朱元璋开拓事业的主要威胁。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取应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设伏，为全军主力。经过一场鏖战，在龙湾登陆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正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挥水陆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转危为安，并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不久，升行省参知政事。龙湾战后的第三年，公元1363年，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大军倾巢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速度慢，朱元璋军船小、速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发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为平章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七月，常遇春先是随徐达率军攻占庐州。接着，又与邓愈会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岭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风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与徐达率军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翦除了张士诚的羽翼，平江（今苏州）孤立无援，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围攻，平江城破，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进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当时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出师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史称塔儿湾大捷。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挥军西进，攻取山西。与精锐的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战，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力竭投降。元顺帝乘明军主力长驱秦晋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驰救北平，元军闻讯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军追奔千里，大获全胜。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病卒军中

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仅40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为表彰常遇春的功绩，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又封子常茂为郑国公，岁禄二千石。常茂隶宋国公冯胜北征纳哈出，不奉约束，被削爵，安置在广西龙州；又别封次子常升为开国公，建文末，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虽古名将，未有过之”常遇春自从1355年追随朱元璋，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1369年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在历次战役中都不乏其例。比如1359年七月，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元将宋伯颜不花悉力守备，常遇春使用各种攻城器具，仍久攻不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挖穴道进入南门瓮城，毁敌所架炮，又策动元将张斌约降，内外夹击，乃夺得衢州。再比如，1360年五月，常遇春与徐达一起攻破了陈友谅的枞阳水寨，陈友谅率大军前来报复，四处扬言要攻取安庆。常遇春经过分析，认为其中有诈，这是陈友谅要夺取安庆附近的池州，是声东击西之计。同徐达商议后，决定将计就计，设伏诱敌，陈友谅果然中计，腹背受敌之下大败而逃。这都是常遇春以智谋取胜的典型战例。所以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常遇春“爱抚士卒”，“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这是自古名将几乎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应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发展屯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特别爱重，认为常

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常遇春也善于处理同主子的关系。1365年二月，当常遇春率军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县班师之后，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貌似宽厚心实险狠的朱元璋自然爱听这样的话了。常遇春忠于朱元璋，39岁暴卒于军中，功成名就，但生平爱杀降为世人所诟。死后，被追封为“开平王”，故六泉口又有“开平寨”之称。

当地村民为纪念常遇春智勇过人，还在大古岭下的在百丈潭侧建庙祭祀，当时称将军庙，庙址所在村落因此得名将军村。该庙规模壮观，翘檐飞角，庙内塑有常将军全身像。抗日战争中庙宇为日军焚毁，但村民仍保留“拜将军年”的旧俗。常遇春灵柩运回南京，朱元璋亲往龙江(今下关一带)祭奠，追封他为“开平王”，溢“忠武”，赐葬钟山，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牌列第二。墓高2.4米，墓基周长约29米。现墓茔与墓前石刻保存完好。有石柱一，石马、石羊、石虎、武将各二。石兽雕刻工艺精湛，神形兼备。武士双手抚剑，顶盔贯甲，威武雄健。现碑上镌刻“明故世祖开平王遇春常公之墓”，系清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重修时其裔孙所立。

胡惟庸

胡惟庸(?~1380)，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洪武六年(1373年)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进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他日益骄横跋扈，故而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注意。后来因他谋反事件泄漏被杀

颇受宠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州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58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猥，一经重用，债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独揽丞相大权，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

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之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就与刘基有过节。恰恰瓯闽间有一片空地名叫谈洋，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纠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璉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对刘基夺俸，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谁知竟被胡惟庸闻知，忌恨在心，企图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但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可见胡惟庸气量狭窄、心计毒辣。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就在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没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法司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此时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嵩，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

罪名升级

朱元璋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不成才告变，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同时被杀。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处死后，胡惟庸案远没有结束，对于胡惟庸的罪状一直都在搜集查证。

洪武十八年(1385 年)，有人告发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佑，不仅是胡惟庸的至亲，还曾经伙同胡惟庸谋逆。胡惟庸虽已被诛，李存义也必须连坐。这可是祸从天降，并且为祸不轻，李家惴惴不安。但是朱元璋对此事并未严惩，还特别下诏，李存义与李佑都免于死罪，只是被贬到崇明岛闲住。可能是因为李善长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旧情，因而特地从轻发落。按理李善长受到如此殊遇，应该上书谢恩，但是李善长对此事全然不予理会，这种态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证一直都在继续着，并且有了新的进展。洪武十九年(1386 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谋反案有了进一步的证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绩。封绩本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于明，据说他经常往来于蒙、汉之间，曾经为胡惟庸给元嗣君送过信，胡惟庸在信中称臣，并请元嗣君出兵为外应。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大将军蓝玉出塞时，在捕鱼儿海地方就捕获过封绩，但是由于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上奏，就把封绩给放了。直到这次，由于封绩再次被捕入狱，李善长终于也被牵连进来了。

恰在此时，李善长为了娱老，大兴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三百名，以供营建。以营卒为工役，这种事情本是常事。但汤和胆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长，因而表面应允，暗中却向朱元璋报告，这无疑是说李善长私自集结兵力。凑巧，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约有数百人，中间有一个叫丁斌的，为李善长私亲，李善长便替他求免。由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没有答应李善长的请求，反而命令将丁斌拿获。